

王派
《水滸》
评论集



扬州评话

王派《水浒》评论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王派《水滸》评论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9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张 13.75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1—2,000 册

ISBN 7-80008-060-9/I·52

定价, 6.10元

目 录

序	罗 扬(1)
论王派《水浒》的形成和发展	陈午楼(13)
王少堂艺术特色论	陈午楼(34)
王派《水浒》书的文学特色管窥	段宝林(71)
——比较文学的一个尝试	
从《武松》谈民间艺人对《水浒》文学的贡献	陈 辽(95)
论《武松》的通俗史诗特征	徐德明(103)
《宋江》艺术成就论	薛宝琨 张蕴和(130)
论王少堂《武松》的人物造型艺术	张祖健(153)
试析《武松》和《宋江》的结构特征	黄显宇(192)
谈王少堂说《武松》的武打特色	王资鑫(207)
——兼谈武打在文艺作品中的意义和地位	
从现象学观点谈到“武十回”的叙事艺术	华逸松(226)
王少堂心里与书里的世界	金 名(237)
试谈扬州评话《武松》中的酒与美	王资鑫(249)
《康文辩罪》的辩罪艺术	黄显宇(256)
《施恩探监》的艺术处理及其他	黄 炽(268)
略论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性	黄显宇(278)
《宋江》随谈	祝子健(292)
《混城》漫评	黄显宇(305)

多彩的人物 多义的主题.....	吴润生(318)
——《三打祝家庄》赏析	
合掌文章.....	陈午楼(323)
——《武松》中两个“辩罪”的艺术构思	
传神俱在阿堵中	左 弦(337)
——谈少堂老人的眼神	
扬州评话人物方言、声调的运用及其组合	费 力(342)
——浅谈王派《水浒》“说”的艺术	
模糊语言在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中的运用	陈午楼(350)
从柳敬亭到王少堂	陈午楼(370)
王少堂的习艺和“过海”	杨 文(382)
评话名艺人王少堂说《水浒》	陈汝衡(393)
教场听书漫忆	王 骧(398)
断想	周 良(402)
少堂与丽堂	赵绍武 刘向东(410)
谈《武松》.....	老 舍(416)
加倍热闹.....	王朝闻(420)
精益求精 一字不苟.....	孙佳讯(422)
——王少堂老人怎样对待“武十回”的整理工作	
《武松》整理工作的回顾	扬州评话研究小组(426)
编后记	汪复昌(435)

序

在纪念我国杰出的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扬州评话王派〈水浒〉评论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国曲艺，历史悠久，品类繁多，积累丰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为了继承和发扬曲艺的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曲艺，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和切实加强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迫切需要加强。比如说，我国曲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状况如何？它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继承曲艺的优良传统和继承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革命传统？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曲艺的成就和经验？当前曲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今后应当如何更好地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丰富人民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一些重要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又比

如说,各个曲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它们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继承和创新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经验和新问题?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也同样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再从曲艺理论队伍建设的情况看,不论是专业的曲艺评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还是业余的曲艺评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现在都还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未能形成既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所长,又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并能有计划地持续前进的群体。如何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并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这也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迫切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扬州曲艺界的同志们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扬州评话艺术及其各个流派的研究和评论,取得显著成绩,对王派《水浒》的研究更有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将他们撰写的部分文章编辑出版,这不仅会对扬州评话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整个曲艺评论和研究工作,乃至理论队伍的建设,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扬州评话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把生动活泼的口头文学和富有魅力的说表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我国的曲艺百花园中独展风姿,争奇斗艳。三百多年来,经过历代著名评话作家和评话艺人的创造性劳动,千锤百炼,扬州评话日趋完美,广为流传,深为苏北、南京、镇江和上海等地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以王少堂为代表的王派《水浒》则是扬州评话当之无愧的艺术高峰。王少堂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苦心经营,博采众长,不仅吸收了扬州评话邓光斗和宋承章这两大《水浒》流派的艺术精华,还不断向同辈学习,向姊妹艺术学习,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学习,在学习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独辟蹊径,终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使王派《水浒》在扬州评话中出类拔萃，成为我国民族文艺宝库中一部恢宏而瑰丽的艺术珍品。评论和研究王少堂及王派《水浒》的艺术成就，对于发展和繁荣扬州评话艺术，乃至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曲艺事业，都是很必要很有益的。这部扬州评话王派《水浒》评论集的出版，可以说是开创了对一位艺术家、一个艺术流派深入进行专题研究的一个范例。全国四百多个曲艺品种及其众多的艺术流派，如果都能全面地深入地加以研究，那么，我国曲艺理论研究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的曲艺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王少堂对扬州评话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对王派《水浒》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的作者们，除少数正在从事或曾经从事过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外，大多数则是业余评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从题材内容、表演手法、艺术境界以及作家和艺人的素质，从评话艺术同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关系，从评话艺术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关系，从评话艺术同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评话艺术的整理、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从评话文学和表演艺术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关系问题，纵横捭阖，点面结合，实事求是地探讨和研究了王少堂的艺术实践和王派《水浒》的艺术特质和艺术成就。陈午楼的《从柳敬亭到王少堂》一文，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王派《水浒》源远流长、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指出这种继承和创新，跟当时扬州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这个社会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徐德明的《论〈武松〉的通俗史诗特征》，则紧扣王派《水浒》的这个社会大背景，论述了《武松》所具

有的通俗史诗般的现实主义特征，指出了王少堂在《武松》中，的确象老舍先生所说的那样：“把近代的人情世态与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人物联系起来，绘声绘色地叫我们看见听见英雄们的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时也看见听见受欺侮的人们的形象与呼吁。”《武松》虽然是在给我们评述英雄的故事，实际上却为我们勾勒出一部光怪陆离的封建社会的图景，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和批判。文学就是人学，王少堂说书，从根本上讲，就是在说人，就是通过说人，鞭挞假恶丑，颂扬真善美。对此，金名在《王少堂心里与书里世界》一文中，作了中肯的分析。他在分析了王少堂的“书里世界”以后，赞誉了王少堂“眼见腐败的清廷官场与军阀的飞扬跋扈，他选择了一条为光明的理想呐喊的道路”，“他的悲愤与希望都集中在武松、宋江、鲁智深、李逵、石秀这些人身上，他们的呐喊就是他的呐喊。”这就使我们看到了王少堂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民艺术家，有着多么鲜明的爱憎感情，有着多么强烈的人生追求。

如果说，上述文章着重从整体上集中阐述了王派《水浒》的久远历史，高度概括了王派《水浒》的思想内容，热情赞誉了王少堂的艺术观和人生追求的话，那么，在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中，更多的文章则从艺术形式方面，整体地或局部地论述了王派《水浒》的艺术特色。黄显宇的《试析〈武松〉和〈宋江〉的结构特征》，从总体上深刻分析比较了《武松》和《宋江》在结构处置上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武松》的主题思想就是突出武松“生平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因此，武松作为一个主人公，他在《武松》中始终处于中心人物的活动位置，成为带动一切人物、牵动一

切事件、调动一切场面的关键人物。这样的艺术场面和安排是完全符合塑造武松典型形象的需要，也是完全适应揭示《武松》主题思想的需要。《宋江》的结构则有别于《武松》。这是因为《宋江》的题旨在于通过宋江的命运这条线索去串联和演绎梁山聚义的发展过程，去刻划梁山好汉的大智大勇，进而去透视和突出宋江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因此，宋江在《宋江》里总是经常隐现在幕后运筹帷幄，而前台则更多地腾出来，让水泊梁山英雄好汉们围绕宋江命运去调兵遣将，大显身手，这种貌似畸轻畸重的结构特征，正是从本质意蕴上体现了《宋江》的主题思想，堪称匠心独运，颇具风采。这篇文章还指出，在情节安排上，《武松》和《宋江》的共性则大于个性。就总体框架而言，《武松》和《宋江》采用的都是“链式”结构，总是把起主导作用的武松和宋江作为中心，布局谋篇。就局部框架而言，《武松》和《宋江》采用的都是“箭式”结构，以一个主要事件作为情节中心，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体系，同时又自觉地服务于总体需要。就某些关键环节而言，《武松》和《宋江》都采用了“靶式”结构，围绕一个核心人物或事件，组成一个网状群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主体描写。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武松》和《宋江》的结构特色，分析概括得颇有见地。陈午楼的《王少堂艺术特色论》，从总体上论述了王少堂的说表细致、密不透风和重视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特色。所谓“表”，就是语言的白描，要求产生“起肥”、“起翠”、“起鲜”、“起俏”的艺术效果。此“四起”实为白描艺术的灵魂，分寸掌握得如何，决定艺术境界的高低，而王少堂于此“四起”，可谓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善于将情节的发展逐步引向“关子”，使人物形象渐趋饱满——这是“起肥”；他善于在表白中铺垫情节，烘托情绪和气氛，逐步推出柳暗花明的新境地——这是“起鲜”；他善于在表白中给人以明快感、绚丽感，使鉴赏者乐于接受美的陶冶——这是“起翠”；他善于在表白中，通过妙趣横生的讽刺和幽默，将生活中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这是“起俏”。而这“四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张祖健的《论王少堂〈武松〉人物的艺术造型》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武松艺术形象的造型特点。武松是一个多侧面的力量型的艺术形象，他有超人的以力行善的理想力量，以力除恶的性格力量，以力取胜的行为力量。武松形象的艺术造型非常典型地表现了王派《水浒》塑造人物的一种艺术技法和模式。这篇文章同时分析了《武松》人物造型艺术的内在效应与美学品级，它能使人们在对英雄业绩产生折服心理的基础上，对丑恶的反面形象拥有压倒优势的心理，因而富有很强的审美感。作者还论述了《武松》人物造型艺术的当代走向，应当也可以有随世顺时的变化。薛宝琨和张蕴和的《王派〈宋江〉艺术成就论》，着重论述了《宋江》的艺术成就。最首要的一点就是从内容上讲，宋江走上梁山态度的转变。《水浒》中宋江表现的是一种严肃而又浸透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文人态度，而评话《宋江》中的宋江则是表现了善良、正直而又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群众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给以最彻底的否定，对有能力反抗这些统治者的人作出积极的肯定。《宋江》艺术成就的另一特征是宋江自愿上梁山这一情节主线的铺叙和发展所具

有的传奇性和严谨性。传奇性是我们民族艺术特有的叙事方式和抒情方式的统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摆脱现实的苦难，战胜命运的乖讹的一种最便捷的途径。《宋江》的情节结构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特点。严谨性是想方设法使故事情节发展具有脉络分明的顺时性和顺序性。《宋江》全部情节发展都是环环紧扣，层层推进的。《宋江》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处理人物和情节时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情节，都比原本《水浒》更真实合理，更前后连贯，更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费力的《扬州评话人物方言、声调的运用及其组合》一文，论述了多种方言与声调的运用，已成为扬州评话的艺术特色之一。相对说来，扬州话语音较“软”，北方话语音较“硬”。从艺术语言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来考虑，说北方话显然更有利于表现武松的英雄气概。因此，在王派《水浒》中武松不说扬州话。这正是为了象王少堂自己所说的那样，评话演员要做到“演到哪一个就象哪一个。”这也说明王派《水浒》在人物的方言、声调方面，既善于运用类型方言、声调，又不囿于类型方言、声调，而是从表现人物的性格出发，让人物的声调里也溶进性格的音符。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在扬州评话里，各种人物不同方言和声调的组合，是由演员一个人完成的。这种精心组合的不同语言和声调，打破了“千人一声”的单调感，它们互相对比衬托，各自特征格外鲜明，可以使人物的语言更具有真实感和主体感，从而更具有说表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王派《水浒》能使人百听不厌、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奥秘。

前面已经提到，王派《水浒》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着难分难解的因缘关系。段宝林的《王派〈水浒〉文学特色

管窥》一文，运用比较文学这种研究民间文学的基本方法，比较研究了王派《水浒》与山东快书《武松传》、王派《水浒》与山东民间水传说、王派《水浒》与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异同，阐明了王派《水浒》的历史源流和艺术特点。同民间传说水浒相比，王派《水浒》的政治性更强，思想性更深刻，但同时也掺进了一些市民的偏见，在尖锐性上往往较为逊色。在人物塑造上，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性格往往比较单纯，只是突出了反抗精神和斗争的坚定性，而王派《水浒》中的人物性格却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跟山东快书《武松传》相比，快书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人物故事都重新改编过，表现了农民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意识，带有很强的泥土味。这与产生在城市的扬州评话大异其趣。在艺术描写上，快书比较粗放有力，用浓重的线条勾勒了武松的英雄形象，跟王派《水浒》工笔细描大不相同。与古典小说《水浒传》相比，评话保留了小说主要情节作为基本线索，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作了提高和发展，它充分反映了封建时代晚期扬州等地城市生活的社会现实，这正是王派《水浒》的艺术特色之所在。如果说段宝林的这篇文章重点阐述了古典文学对王派《水浒》的规范作用的话，那么与此相反，陈辽的《从〈武松〉谈民间艺人对〈水浒〉文学的贡献》一文，则就心理描写的具体性、揭露旧社会的深刻性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这三个方面，重点肯定了王少堂的《武松》对于《水浒》的补充、扩大和增益，为丰富和提高《水浒》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心理描写的具体性方面，《武松》要比《水浒》更细致、更动人，它不仅描写人物做什么，怎么做，而且描写人物想什么，怎么

想，且都写得合情合理，符合人物性格。在揭露旧社会的深刻性方面，即使下层文人，他们揭露旧社会，或者存有某种程度的顾虑，或者受他们自身阶级属性所限，因此常常是不彻底不深刻的。《武松》则不然，它在描写旧社会的官场时，就把官场的腐败、黑暗、营私、舞弊比较彻底地揭露出来了。在刻划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方面，《水浒》一般是抓住人物性格的核心，写出人物性格的“这一个”，《武松》基本上也沿用了这一套手法，他通过说表艺术，多方面地刻划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生动、真实。文章从以上三个方面肯定了王少堂的《武松》对《水浒》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后，又强调指出，建国以后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中，对此几乎完全都略而不提，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作者呼吁，应当如实恢复民间艺人在《水浒》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这是非常公允和必要的。

上面列举了王派《水浒》评论集中的有关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集中研究了王派《水浒》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派《水浒》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王少堂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那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上。对这种表演艺术，这部评论集中有不少专家著文论及。左弦的《传神俱在阿堵中》，从自己当年身临其境，聆听和欣赏王少堂说书的生动场景，追述他所深切感受到的王少堂运用眼神强化说表的非凡功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王少堂善于用眼神表达评话中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角色内心世界的思想感情，通过眼神的瞬息万变，显示情节不断发展的波澜，揭示人物思想感情的起伏，最终为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已故陈汝衡教授的《评

评话艺人王少堂说《水浒》，对王少堂的说表艺术同样赞叹不已。王少堂说书，从不离开座位，只是口讲指划，表演得异常出色，他能以动境来衬托静境，甚至能用口技产生不寻常的音乐效果。他只需凭着状物表情，手口相应，就能在书坛一瞬间移人性情，将他的悲欢哀乐，化成听众的悲欢哀乐，让人越听越感受到此中艺术的高超和精湛，令人不能不钦佩不已。王襄的《教场听书漫忆》、周良的《断想》、王资鑫的《谈王少堂说《武松》的武打特色》等文章，都洞微烛幽，小中见大，论述了王少堂卓越的表演技能和不同凡响的表演风格。赵绍龙、刘向东的《少堂与丽堂》一文，从培养王派《水浒》评话艺人的角度，推崇了王少堂对青年艺人既满腔热忱，又严格要求的精神。汪复昌执笔的《〈武松〉整理工作的回顾》、孙佳讯的《精益求精，一字不苟》两篇文章，则从《武松》整理工作这个侧面，回顾了《武松》整理工作的全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领导重视，上下齐心，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正确处理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大力发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以及在展开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逐步统一认识，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这都是《武松》整理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经验，也为传统曲艺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还进一步看到了王少堂为人的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为艺的精益求精，一字不苟。这些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收入这部评论集的老舍和王朝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论及王派《水浒》的谈话和著述，都高度评价了王少堂“密切结合群众，知其所需，从而供

应”，让评话艺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高度评价了王派《水浒》的审美原则和美学价值。这对于我们认识王少堂的艺术成就很有好处。

（总之，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的作者们，或者从纵的方面对王派《水浒》进行研究，或者从横的方面对王派《水浒》加以比较；或者从整体上对王派《水浒》进行论述，或者在局部上对王派《水浒》加以评析，整个评论集涵盖较广，容量较大，论点大都新颖独到，论述大都深刻有力。可以说，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已经显示了相当可喜的理论深度和力度。这不仅是扬州评话王派《水浒》的评论和研究的一大成果，也是整个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的一大成果。我们从中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派《水浒》鲜明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更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少堂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艺术追求。就其人生态度而言，王少堂努力使评话艺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做到呼人民之所呼，吐人民之所吐，表现了一个杰出的人民艺术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就其艺术追求而言，王少堂既善于批判继承，又善于推陈出新，一生充满了强烈的探索意识和不懈的求新精神，特别是他在表演艺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更为后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应当说，王少堂在他六十多年孜孜矻矻的艺术追求中，为我们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而我以为，最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当是他在为人和为艺这两个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这为社会主义曲艺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这也为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的出版，只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它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王派《水浒》评论和研究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只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开拓和带动作用。事实上，王派《水浒》的评论和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但已经整理出版的王派《水浒》中的《武松》和《宋江》需要继续花气力进行深入评论和研究，正在整理等待出版的《卢俊义》和《石秀》，更需要我们从零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和评论。推而广之，整个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既然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那就更需要我们重视和加强这个方面的工作了。

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的出版，用事实启发了我们，使我们看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文化部门和有关高等院校的理论工作者，热心于并有能力从事曲艺理论研究的，大有人在。关键在于如何积极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我们都象这部王派《水浒》评论集的组织者那样，思想重视，目标明确，要求具体，措施切实，我们就一定能把分散在社会上和文艺界的曲艺评论和理论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凝聚起来，形成气候，搞出成果。我们也就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尽快改变曲艺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不断开拓出曲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罗 扬

一九八九年十月